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7.02.019

关于郭麐生平若干问题的考论

鹿苗苗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 郭麐乃清代乾嘉道时期著名诗人、词人,浙西词派后期代表人物,其生平虽有研究者涉足,但仍有揣误,对郭麐文学研究造成误识。文章从郭麐最初之别号及其早期别号变化情况、参加举业的次数及期间的思想变化、迁居流寓及原因等三个问题着手对其生平进行考论,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和思路,以便为深入研究郭麐其人、其文学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 郭麐; 生平; 考论辨析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7)02-0191-05

Confirmation of some issues concerning Guo Lin

Lu Miaomiao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Guo Lin is a famous poet and verse writer and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late Zhexi Verse Group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Some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into his life, but there are some mistakes in their study, which have caused mis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his literature study. Three aspects are focused, which include his initial nickname and the change in his early nicknames, the times in which he attend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his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period, and his translocation and its causes. Some new viewpoints are proposed to offer effective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ies on Guo Lin and his literary work.

Keywords: Guo Lin; life; confirmation

郭麐(1767—1831),字祥伯,号频伽。江苏吴江人,清代乾嘉道时期著名诗人、词人。现存诗集、词集、诗话、词话、杂著等作品集二十余种,其作品生前一再刊刻,是嘉道时期颇有影响的文人。

郭麐的生平事迹、学问人品,同时代好友冯登府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皆有记述,^①史书地方志等典籍多从其说。当前对郭麐生平叙述详细的有三篇硕士论文值得注意:黄丽勤《郭麐研究》、王蓓蓓《论郭麐及其词风的新变》和笔者《郭麐年谱》。笔者通过对郭麐及其友朋作品的研习,着

重对其改动别号、从积极应举到慨然弃举以及移居流寓等生平问题进行考论,进而为研究郭麐乃至江南下层士子群体的相关文学提供参考。

一、郭麐最初别号及其后别号的变化

古人一般除了自己的姓名之外,还会有字和别号。“字”常常是“名”的解释和补充,而别号多不受家族、行辈的限制,一般寄寓着本人的性格、遭遇、志向或者感慨。每个时期,文人的志向和遭

① 参见冯登府:《石经阁文集》卷五,《频伽郭君墓志铭》,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收稿日期:2016-04-18

基金项目:2015年福建省教育厅科研项目(JAS150390);2015年福建工程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GY-S15090);2014年度福建工程学院校科研启动基金项目(GY-S14067)

作者简介:鹿苗苗(1985-),女,山东淄博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

际可能有所不同,别号亦可能随之而变。关于郭麐字、号,各类史书、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十二:“郭麐,字祥伯,自号频伽居士。”(光绪)《嘉善县志》《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儒学案小传》皆同其说。《清画家诗史》:“郭麐,字祥伯,号频伽,又号白眉,一号蓬庵居士。”^[1]冯登府《频伽郭君墓志铭》介绍最详:“君讳麐,字祥伯,频伽其号,年五十号曰蓬庵,六十曰复庵,而频伽最著。”

从各类文献中可知“频伽”乃郭麐最著名之别号,使用时间亦最长,友朋文章中多以此称呼郭麐。但此号并非郭麐最初别号。袁棠《秋水池塘诗》稿本中称呼郭麐为“舟壘”,当为初号。^①现今郭麐研究中皆未发现其“舟壘”初号。《秋水池塘诗》之《怀郭十三泰兴》诗中注“舟壘为宣城袁实堂师所赏”,《饮宝剑堂赠郭舟壘、丹叔昆仲,兼示徐江庵、朱铁门》等多处以“舟壘”称郭麐。后袁棠刻本《秋水池塘诗集》在稿本基础上进行筛选整理,稿本中的“舟壘”皆更换为“频伽”;郭麐《灵芬馆诗话》卷三首章回忆与袁棠、朱春生早年交游所作之诗时,亦有如“铁门《送舟壘之淮阴》”诗之初号出现。在题识为《九月初喜得湘眉大兄札录呈正》的郭麐手书作品中,亦有“舟壘”铃印。因此,在“频伽”别号前,“舟壘”确为其最初别号。

其“舟壘”初号何时停用,具体时间不详。但据袁棠诗集稿本中朱笔修改以及称呼上的变化仍可窥视一二。袁棠自与郭麐相识后诗词中皆以“舟壘”称之,直至《过昆陵驿同舟壘作》后所作诗中不再再现,紧接此诗为《十三夜舟次有怀次频伽韵》等诗,改称作“频伽”。若此时郭麐停用“舟壘”之号,此诗的写作时间便可能是郭麐停用初号的时间。袁棠《秋水池塘诗》稿本虽不分卷,但此诗写作时间仍可考察。稿本中此组诗作相连:《孤帆同舟壘作》《常州道中联句》《过昆陵驿同舟壘作》《十三夜舟次有怀次频伽韵》《丹阳溯流至丹徒联句》《陶庄舟次同频伽作二首》《渡江联句》《七月十五夜龙潭道中(次云客韵同铁门频伽)》,皆为舟行道途所作,人物有袁棠、朱春生和郭麐三

人。且此前有诗《七夕赠竹士并怀舟壘淮上》,其二诗中注有“戊申七夕,同青庵舟壘丹叔暨云客弟小饮竹溪堂,以花入曝衣楼分韵”,虽说稿本不分卷,但是诗作抄录是按照时间进行排序,因此说,“舟壘”初号停用当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之后。是年郭麐曾与朱春生、袁棠、袁鸿舟行前往金陵赴试,同舟唱和甚多,时间亦吻合。

“壘”本是古代祭祀之用的礼器,“舟”虽多泛指水上交通工具,但亦有祭祀礼器之意,《康熙字典》中解释道:“古彝有舟,设而陈之,为礼神之器。”“频伽”本义是一种来自西域的鸟,是迦罗频伽或迦陵频伽的简称,因其鸣声清脆悦耳,在佛经中是一种常在极乐净土的妙音鸟。郭麐将别号由古代容器之“舟”“壘”改为拥有清脆悦耳的妙音鸟,可见郭麐对自由、纯净生活的向往。在此之后,郭麐又两次改动别号。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时值郭麐五十岁。正月二十一日,其生辰后一日,郭麐改号“蓬庵”,云:“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子犯有言‘臣自知之,往者之非,改不有年’。因以自号,即冠以后之诗。”^②因此《灵芬馆诗四集》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皆名为《蓬庵集》。而至道光六年(1826年)六十岁时,又改号“复庵”。一是由于郭麐生于丁亥年,六十年之轮回已至;二是取《急就章》中“长乐极老复丁”之语,将其所居易名“老复丁庵”,勉自策厉。两者合之即改号。^③后来改动别号时间、动机皆有据可考,而最初别号并未出现在研究郭麐的视野中,因此厘清郭麐最初别号及改动时间和动机,亦是郭麐生平研究乃至早期思想变化研究的重要一环。

二、郭麐从六次应举到慨然弃举的思想变化

研究者对郭麐参加举业的次数说法不一,比较明确的是郭蓓蓓认为共4次,^[2]曾瑱则取陈玉兰3次之说。^[3]郭麐曾道“智非应举”,却“辄下五行才谢”,自说有5次应举行为。^④但据笔者考察,其参加考试有以下6次:1.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11岁,参加童子试。2.乾隆四十七年(1782

①参见袁棠:《秋水池塘诗》,清嘉庆稿本。

②参见郭麐:《灵芬馆诗四集》卷九、《蓬庵集》小叙,本文所引郭麐作品皆出自上海图书馆藏郭麐撰、许增重订《灵芬馆全集》,清嘉庆至道光年间(1796—1850)娱园重订刻本。

③参见郭麐:《灵芬馆诗续集》卷四小叙。

④参见郭麐:《灵芬馆杂著续编》卷四《与彭甘亭书》。

年),16岁,参加考试补诸生。3.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17岁,至金陵参加乡试。4.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22岁,至金陵参加秋试。5.乾隆六十年(1795年),29岁,入京参加恩科会试。6.嘉庆五年(1800年),34岁,至金陵参加乡试。

郭麐少小学诗学文,受正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出世愿望极为强烈。祖父郭鏊对其父郭元灏“若弟读书,无问家人生产。学之成败,若责也;家之羸绌,不若责也”的告诫,^①即已说明其祖辈在举业问题上积极的态度,希望子孙借读书来改善家族的困境。父亲郭元灏更是屡次参加考试,却屡次落第,终老乡间。父亲过世后,全家重担落在长子长孙郭麐肩上。他常年乞食在外,出行之前亦有“妄意一日小得发达”的侥幸心理,虽说其目的是使家中长辈“优游以终”,但郭麐对科举的心切也是不言而喻。^②23岁读书钟山书院,时值姚鼐主讲钟山。郭麐虽为姚鼐名满天下的文名所动,却“时方应试,不暇及学问之事”。^③29岁入都参加京兆试,他更寄予无限希望,“人穷多妄想,士贱出奇计。长安远于天,无乃居不易。行李已褴褛,而况旅食费。然而意一发,辟如马脱轡。交知相怂恿,更若骑虎势”。^④长辈的殷切希望,摆脱家族困境的渴求,个人入世的强烈愿望,都切合郭麐寄希望于举业而得到成功的心态。

然而,郭麐对于举业又是反感的甚至是批判的。郭麐在好友沈大成墓志铭中写道:

科举之学,甚矣。自童子试以至乡举进士,发名成业为大官,所试程度虽愚不肖,皆可习而能也。而高明犖之士,或有不得,或十年数十年。其学不同,所主试之人又不同其程度。然人莫不颀首抑气,竭智力而为之者。贫贱之士,他无所由,委折趋赴,亦有一二自信者,亦遂得之,世以为能。而颠踣顿撼,遂有老死而不知止者,其愚不肖则已矣。有可以自立者,而沈没于此,大不可哀乎!^⑤

这里对科举之事发出振聋发聩般的反叛之声。其中言及以下两点:一是科举本身的迂腐。

考试程度在郭麐看来是“愚”的,只要进行专门的学习,对于儒生来说科举考试在客观上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主试之人又不同”,因而学问各有不同,在选择录取方面又有极大的主观性。因此,这样的科举考试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二是科举对士子的制约和伤害极大。因科举考试之程度较低,士人只能依靠不断的考试以求得到自己所需。特别是对于郭麐所说的“贫贱之士”,此等士子将科举作为改善自己和家族命运的主要途径,因此“老死而不知止者”甚多,以致沉沦于此而最终丧命。沈大成一直在举业中前行,郭麐将科举视为杀害好友的刽子手。

在乾隆乙卯(1795年)恩科会试中,郭麐两试成绩皆第一。虽然他对科举无好感,但应举帖括之文对于郭麐来说得心应手。然而最终仍落第,原因竟是“围中以奇字不售”。^⑥现实的残酷使他心灰意冷而萌生绝意进仕的念头,其言:“乙卯岁,下第出都。……余于乙卯后两遭母忧,自念虽得科第作美官,何益于所生,遂决意名场。”^⑦又云:“余应举,亦思有所得,以为父母荣,……。生命不辰,重篝酷罚,悲忧摧沮,遂无意于进取。”^⑧

从以上两则引文中可看到郭麐对于举业的矛盾态度。“得科第作美官”“有所得”“父母荣”,都是郭麐希望科举能帮他实现的愿望和抱负。然而参加科举的经历,令他萌生了弃举的想法。郭麐弃举的原因可以说与其家中长辈生命的消逝有关,当“生命不辰”,又何来所谓的种种益处。

郭麐34岁参加金陵乡试后便不再涉足科举之事。在其墓志铭和地方志的记载中皆有其29岁京兆试后弃举之言,冯登府云:“(麐)少应省试及一应京兆试,辄不遇,三十后遂绝意举业,专力于诗古文词。”(嘉庆)《嘉善县志》卷二十五则记载:“(麐)乾隆乙卯赴北闱,法时帆学士先施纳交,报罢归,绝意仕进,为诸侯宾客以老。”两家说法虽与郭麐34岁又踏足闱场的行为不符,但仍有绝意科举的前兆。其实恩科会试的失败确实对郭

①参见郭麐:《灵芬馆杂著》卷一《先君子行略》。

②参见郭麐:《灵芬馆杂著》卷一《族祖父汉冲公权厝志铭》。

③参见郭麐:《灵芬馆杂著三编》卷一《姚姬传先生墓志铭》。

④参见郭麐:《灵芬馆诗初集》卷四《入都录别》其二。

⑤参见郭麐:《灵芬馆杂著》卷一《沈集元墓志铭》。

⑥参见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六《金手山学莲出所著商定》,清嘉庆十二年刻本。

⑦参见郭麐:《灵芬馆杂著续编》卷一《蒋母金太安人墓志铭》。

⑧参见郭麐:《灵芬馆杂著续编》卷二《山礬书屋诗初集序》。

磨打击较大,成绩第一,只因文字涉奇而不售,所谓“京华垂翅”是也。同时又遭遇“中更家难”,身为郭家长子的他“仍以衣食见驱,往来吴越间”,心情自然是悲痛万分的。^①其33岁移居魏塘,友沈大成卒,悲痛地写下悼念好友的墓志铭,对举业进行了批判。经历了这些伤痛之后,于34岁那年参加乡试,“席帽麻衣,复寻旧迹。轻烟澹粉,重入懂场”,^②而此时郭磨已是意气不再,“天以功名磨士气”,^③即其所谓“自弃”也。

除以上科举给士人造成的伤害以及郭磨自身遭际之外,好友的遭遇更使其看清科举真面目,从而走向弃举。在郭磨的交游中,彭兆荪、姚椿、汪中等人亦是绝意科举的典型事例;而汪家禧、陈鸿寿等人在科举中的遭遇更影响着郭磨。汪家禧本于“嘉庆癸酉例当选拔贡生”,而且“乡试已中式”,然而主考官“以其三场策问对无遗者疑之,遂抹去”,因此学问高深,“策之奥博”却成为科举失败的原因。^④袁棠等友“尤厌帖括,专心有韵之言”。^⑤而陈鸿寿满腹经纶,却生不逢时:

自吾束修交天下之士,其经济材术,文雅博瞻,魁奇吴伟,可以追踪古人者颇自不乏。而以扶植气类,宏奖后进,使各成其材以备世用,又其量足以容受大小无所不周,则惟吾曼生一人惜乎!其位与年皆不称其志,而遽赍此入地也!^⑥

值得庆幸的是,“功名失意亲文字”,^⑦在科举中屡战屡败的郭磨等士子,却在文艺创作方面成果卓著。曾几何时,郭磨还自嘲喜好吟咏而荒于举业,帖括之文不善作,是“不幸”之事,^⑧但他还是顺应自己的心性,及时退身,在文学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或许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三、郭磨两次移家及其原因

郭氏一族本居浙江秀水,明代中叶迁居江苏吴江芦墟村。至于因何离开家乡秀水而迁至吴江,已不得而知。在郭磨有生之年,其家又有两次

移居的经历。此举在地方志中皆有简单涉及,然而移居次数、时间、地点的变换皆语焉不详:(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二十二言其“晚年迁嘉善东门之江家桥”,(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二十五道“嘉庆戊午,与弟凤侨居嘉善”。冯登府作墓志铭言“世为芦墟人,自君始迁嘉善东门江家桥”。

第一次移家在嘉庆四年(1799年),由江苏吴江芦墟迁居浙江嘉善魏塘卖鱼桥。《灵芬馆诗二集》中《移家集》小序中言道:“嘉庆己未,余移家魏塘。”《灵芬馆诗话》卷七也言明:“嘉庆己未移家魏塘。”时郭磨33岁,(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将其提前一年。

第二次移家在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从魏塘卖鱼桥移居至魏塘东门江家桥北。此次为魏塘境内之迁居。移居江家桥北的澄湖是吴越分界处,“永惟先茔在,有港名澄湖。地接吴越界,旦暮舟可掣”,^⑨风景优美。《灵芬馆诗二集》卷十《琴邬旧庐书壁歌为屠孝廉作即订来魏唐之约》诗中提及此年移家之事:“草堂今岁又移居,已扫新泥雪色壁。”《灵芬馆诗三集》卷一《后移家集》小叙言:“嘉平之月,复自卖鱼桥移居东门之江家桥北。盖来魏唐六年,至是始买宅定居焉,为《后移家集》。”

郭磨为何移居魏塘?第一,直接原因当与郭磨诗文中不曾明言的家中事故有关。郭磨为其亡父郭元灏下葬之事有诗云:“先人骨肉今归土,孤子生全或荷天(时有家衅)。”^⑩其中“家衅”二字令人匪夷所思。而观其诗文作品,皆未言明为何事故,仅从只言片语中窥探一二。

“余少孤,无似敝庐,仅半亩,不克守,僦屋他县,仍岁岁走四方,每一念及,卽旦然如失路人……未尝不徘徊自伤也。”

“仆幼而孤露,止半亩之宫,长游四方,乏十金之产……转徙流漓,移家魏塘僦居卖鱼之桥。”

“嘉庆己未,余移家魏塘。故友乖离,先酬荒

①参见郭磨:《灵芬馆诗二集》卷一《近游集》小叙。“中更家难”当为生母翁夫人去世之事。

②参见郭磨:《灵芬馆诗二集》卷六《白下集》小叙。

③参见郭磨:《灵芬馆诗二集》卷六《归自白门邀同独游至舍并柬寿生》。

④参见郭磨:《灵芬馆杂著三编》卷一《汪选楼墓志铭》。

⑤参见郭磨:《灵芬馆杂著三编》卷一《朱铁门墓志铭》。

⑥参见郭磨:《灵芬馆杂著三编》卷一《陈曼生墓志铭》。

⑦参见郭磨:《灵芬馆诗初集》卷四《迟铁门次丹叔韵》。

⑧参见郭磨:《灵芬馆杂著三编》卷八《道中寄曹种水书》。

⑨参加郭磨:《灵芬馆诗三集》卷一《后移居诗四首》其四。

⑩参见郭磨:《先君子卜葬于澄湖港诗以述哀三首》,《灵芬馆诗二集》卷二。

落,青山丙舍,顾之潜焉,情不能忘,事非得已,拉杂感慨,时见乎词。”

这三条材料皆言吴江祖居破败之象以及自己流寓他乡的感慨,而其中“不克守”“事非得已”以及“故乡不及故人亲”皆隐含移居他乡的无奈。从现有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在郭麐高祖之时,郭氏一族已贫困不堪,“吾家世贱贫”,以至于“曾王父时所遗产不足以活”。^①《灵芬馆诗三集》卷一《后移居诗四首》其四言道:“数传家中落,老屋为邻租。我祖竭心力,乃后还其初。始吾来魏唐,岂轻去乡间。”从诗中知芦墟老屋曾因家道中落而被邻居所租,而“百岁故居成逐客,一湖新水送全家”、“我生之老屋,逼迫偿邻逋”、“至今属他姓”,则已言明因家贫无力偿还外债,老屋被邻里强行霸占,因此在当时可能出现争执甚至武力,才被郭麐称之为“家衅”。祖屋被占,无处可去,不得不离开家乡另寻他处。

第二,与魏塘诸友交往过甚,其间的情谊促成移居。芦墟与魏塘在行政区划中虽属不同行政属地实际仅一汾湖相隔。在郭麐以及友人诗中皆有提及,两地只需扁舟一叶,即可到达。因此郭麐与嘉善诸友经常行舟至其中一地相聚。郭麐与嘉善朋友交谊甚深:沈大成祖父与郭麐父亲为忘年之交,二人早年即已相识。黄凯钧、黄安涛、黄若济、释漱冰、朱元秀、汪继熊等人皆在认识沈大成后逐一相识,时有雅集,并成昆弟之谊。黄氏一家与郭麐兄弟感情最深,希望郭氏兄弟移居魏塘,因此郭麐有云:“始余因沈瘦客得交魏塘之诗人黄退庵、释漱冰。后遂移家于此,亦以三人故也。”^②其父郭元灏去世时郭麐已20岁,然其下葬却在父亲去世后11年。个中原因与家贫无力筹划有关。郭麐于嘉庆二年(1797年)十一月,终为亡父卜地葬

于嘉善澄湖港。郭麐在祖屋被占无家可居的情况下,选择好友众集的魏塘是比较好的选择,而当时卜葬之地也可能在魏塘诸友的帮助下完成。

因此郭麐移居魏塘,可以时常与魏塘诸友互有集会;新家与父亲下葬之地澄湖距离较近,可守护先人;同时魏塘与芦墟一叶扁舟即可通达,虽是离乡,距离不远,可时常回乡探视。在中国传统士人眼中,除因官宦迁徙外,背井离乡而寓居他乡,是不轻易为之之事。即使移居之后郭麐对新居表达了喜爱,并有魏塘诸友相伴,但“怛然如失路人”的徘徊自伤却是流寓生活充满不确定感的真实流露。流寓他乡已将郭麐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而为了一家生计又不得不离开流寓之所,再去他处客游乞食,更增添了凄楚哀叹之感,“细思乡里村夫子,终胜寻常行路人”。^③对于郭麐来说,“移居还似寄居虫”的双重流寓生活给他带来精神和身体的压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因此郭麐对于“家”的概念自始至终颇为敏感,在文学创作中对于“家”“宅”“屋”等表现出强烈的期盼。

总之,关于郭麐改动别号,特别是对现今学术界并未发现的最初别号的考证,可以间接地反映郭麐早期思想变化的脉络,从而考察对其文学创作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郭麐参加科举考试及其心态变化的考证,则从一个传统士子角度,对深度挖掘清代乾嘉时期江南下层士子群体的生存状态有一定的标本意义;迁居研究不仅能了解郭麐最直观的生活情况,还能清晰地展现郭麐在一定地域内的文学交游情况,从而窥探郭麐文学中可能出现的地域性文化内涵。因此,本文探讨的三个问题不仅仅是对郭麐生平相关问题的考证,还能完善郭麐生平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学理链条。

参考文献:

- [1] 李浚之.清画家诗史[M].北京:中国书店,1990:316.
- [2] 郭蓓蓓.论郭麐及其词风的新变[D].广州:暨南大学,2008:7.
- [3] 曾瑱.“有沉雄骚赋,激烈鸡舞”——郭麐词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06:8.
- [4] 郭风.山簪书屋诗集[M].吴江:出版社不详.清嘉庆十四年—道光三年刻本.
- [5] 郭麐.灵芬馆印存[M].嘉兴:昌羊室,清光绪二十年铅印本.
- [6] 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许秀清)

① 参见郭麐:《族祖父汉冲公权厝志铭》,《灵芬馆杂著》卷一。
② 参见郭麐:《灵芬馆诗话》卷七。
③ 参见郭麐:《竺生见过话别三首》其二,《灵芬馆诗初集》卷四。